

这所党校的历史是辉煌的，也是沉甸甸的。她沐浴着党的光辉，一路沧桑，曲折曲折，是无数的鲜血和汗水凝成了她独特的红色基因，见证着她的初心和使命……

她历经战争烽火与革命斗争的洗礼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，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，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。1938年10月，在党的坚强领导下，为培养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，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党校，在硝烟弥漫的沂蒙山区应运而生，她是全国建立较早的省级党校之一，当时公开的名称叫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分校。1938年12月，更名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党校。1940年12月，更名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高级党校。1955年1月，山东分局撤销，更名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。1955年4月，山东行政学院、政治学校与省委党校合并成立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。1958年12月，复名为中共山东省委党校。1968年12月，党校停办。1972年6月，重建山东省委党校。2018年10月，重新组建山东省委党校（行政学院）。从她名称的变迁中可以看出，她在抗战的硝烟烽火中诞生，伴随着解放战争的滚滚车轮前行，在火热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发展，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踏上民族复兴的新征程，她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前进相辅相成。

这里的师生曾经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。在战争年代，不管是生死考验的前线，还是生产劳动的后方，经常听到党校师生感人肺腑、可歌可泣的故事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行动生动地回答了“为了谁、依靠谁、我是谁”这个大问题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我们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山东大地风起云涌。1939年6月，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分校跟随山东分局、八路军山东纵队在反“扫荡”转移的过程中，在沂水梭峪与日军遭遇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，从校长到学员都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，有近60位同志献出了宝贵的生命。1941年11月，日军大扫荡，在大青山突围期间，党校的警卫连冒死投入激烈的战斗。党校学员的记忆是丰富的，有的曾在回忆录里记述了这样一个不平凡的故事：胶东特委为争夺招远的黄金资源，与日伪汉奸进行了殊死搏斗，很多胶东儿女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，源源不断地将43万两黄金运往延安，为中国革命作出了

编者按：党校因党而立、因党而兴、因党而强，党校创立和发展的历史，始终与党的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。从即日起，学习时报在综合文化版开辟专栏“党校红色记忆”，共同追忆和回顾党校的红色历程。



□陈 帆

山东省委党校：见证初心使命

特殊贡献。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根据华东分局指示，一次就从山东分局高级党校选调350名学员组成干部队南下。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，党校办学靠的是坚定的信仰和信念，那时候没有固定的教室和教员，上课就在战斗间隙，经常露天教学或临时搭建草房学习，教员都是党的领导干部，郭洪涛、朱瑞、罗荣桓、张鼎丞等曾经既担任校长，也担任教员。罗荣桓元帅曾在1943年任山东分局书记、党校校长，当时他为自己制订了“节约计划”，不领保健费、烟茶、火柴等，下雨天管理员给他买了一双胶鞋，他严令退回，把旧鞋子补补后继续穿。开国上将肖华曾在1940年任山东分局高级党校副校长，《大辞海》的主编夏征农曾在1955年任中共中央第四中级党校校长，他们都留下了很多具有忘我革命精神的佳话。在战争年代，山东分局党校有一首著名的毕业歌，里面唱道：“同志们，抗战的吼声四起。你

看，党旗在火光中高举，我们热烈地相聚，热烈地分离。学习，斗争。斗争，学习，在工作中锻炼自己。握紧锐利的武器马列主义，抱定坚定的立场无产阶级。稳定地站在抗日统一战线上，用无情的铁拳，击碎汉奸、托派、日本帝国主义。努力，努力，党在热望着你。再见，同志，到前线去，到广大群众中去！”学员们唱着《毕业歌》《跟着共产党走》《沂蒙山小调》这些脍炙人口的根据地歌曲，通过党校的洗礼，不断地提升党性修养，坚定理想信念，许世友、张仁初等杰出将领，以及后来的郝建秀、孔繁森等先模人物，都是从这座校园里走出来的杰出代表。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，山东省委党校就制定了《山东省委党校工作条例》，其中规定：党校教授要达到县委书记的水平，助教要达到公社书记的水平。回首那些载入历史深处的一幕幕，那些老师、学员们是何等的不平凡啊。

这里的校园曾经浸染过先烈们的热血。现在山东省委党校的老校区，是我们党史上著名的“四五”烈士就义的地方。1931年4月5日，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（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、青岛市委书记等职）、时任山东省委书记的刘谦初（毛岸英烈士的岳父）、时任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长的刘晓浦（其侄刘一梦同时牺牲）等22名中国共产党山东组织的早期领导人，高呼着革命口号在这里英勇就义，其中时任中共山东省委妇委书记的郭隆真（1919年与周恩来、邓颖超一起发起成立“觉悟社”），因反抗激烈在赴刑场前被杀于狱中。刘晓浦是1929年被捕入狱的，为了救他出狱，家里变卖所有家产，从富裕的地主变成“一无所有”，家人来赎他出狱时，他断然拒绝，因为“只有自首才能出去”，让他放弃信仰，“是永远办不到的！”他用生命诠释了什么是信念坚定、什么是绝对忠诚。这片热土见证

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、信仰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人为民族独立、为人民解放视死如归的大无畏革命精神。目前，这里正在建设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党性教育基地。

这所党校与沂蒙精神紧密相连。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时深刻指出，军民“水乳交融、生死与共”铸就的沂蒙精神，与延安精神、井冈山精神、西柏坡精神一样，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。山东省委党校革命战争时期的活动区域基本上是在沂蒙山区，可以说生在沂蒙、长在沂蒙、壮在沂蒙，是沂蒙精神滋养出来的红色学府，通身流淌着革命老区血脉，她既是沂蒙精神的天然受益者、泽惠者，是沂蒙精神形成发展的积极参与者、见证者，更是沂蒙精神发扬光大的自觉践行者、传播者。今天，沂蒙精神成为这座红色学府薪火相传的精神特质，早已广泛地“进教材、进课堂、进头脑”，成为山东省委党校学员的必修课，是党校教学科研的一张亮丽名片和品牌。

这所党校的事业饱含党的领袖和中央领导的关心关怀。2018年6月12日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胶东（威海）党性教育基地时，与正在开展党性教育的山东省委党校中青班学员亲切握手、亲切交谈，“要警钟长鸣，铭记历史教训，13亿多中国人要发愤图强，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大”的时代强音，一度沸腾了整个校园。

抚今追昔，山东省委党校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，经常受到党中央、党的领袖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关怀，

尤其在重大历史关头为党校的发展壮大指明了前进方向。1938年5月，曾任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的郭洪涛，带领50多名干部来山东开辟抗日根据地，并担任新组建的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和省委党校第一任校长。临行前，毛泽东亲自接见他们，作出重要指示，寄予殷切期望；刘少奇、陈云分别与其谈话，给予指示和勉励。1942年3月，刘少奇受党中央委托到山东指导工作，连续作了《思想方法问题》《群众运动问题》《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问题》等8次报告，当时的党校师生参加了上述活动。刘少奇指出：“要办一个好的党校，提高干部的理论 and 政策水平。”1957年3月18日，毛泽东视察山东时在济南珍珠泉礼堂作重要报告，省委党校部分师生现场聆听，并受到毛泽东亲切接见。

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央领导多次听取山东省委党校工作汇报，或亲临党校视察，作出指示批示。1994年3月，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召开，中央领导同与会代表座谈时，听取了山东省委党校工作汇报。1994年9月，胡锦涛在《党委办党校，部门大合唱，自身有作为——山东省部分党校情况的调查》上作出重要批示：“山东省委重视党校工作，党校本身也努力开拓，积极进取。建议总结 and 介绍他们的经验和做法。”1999年1月，胡锦涛在山东省省委党校视察时指出：“有了一流的设施，应该努力创造一流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，培养一流的人才。”2000年6月，中央召开全国党校工作会议，山东省委党校再次汇报了工作。2012年7月，在全国党校校长会议上，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3次提到山东党校工作，对党校立足本地现代农业优势，为全国各地党员干部进行农业产业化培训，给予了充分肯定。这些殷殷的嘱托、亲切的教导，让党校人倍加鼓舞、倍受鞭策、倍增信心。

新时代赋予党校新使命，新征程呼唤党校新作为。悠悠校史上的那些光辉篇章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党校人坚持党校姓党、全面从严治校，为传播共产主义大道无怨无悔地奉献青春和力量！

党校红色记忆

未央宫之辩

□王 煦

未央宫，西汉都城长安最宏伟壮丽的宫殿，其规模据称有北京紫禁城的六倍，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宫殿建筑群之一。不过，未央宫在建成之初，曾出现过争议。其当事人恰是缔造汉王朝的核心人物——皇帝刘邦和丞相萧何。公元前200年的春天，刘邦叛回到长安。当时萧何正负责建设帝都正宫未央宫。不料，“上（刘邦）见其壮丽，甚怒”，责备萧何：“天下匈匈，劳苦数岁，成败未可知，是何治宫室过度也！”萧何则答道：“天下方未定，故可因以就宫室。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，非壮丽无以重威。”对这番回答，刘邦很是满意（“上悦”），于是安然住进了未央宫。

“非壮丽无以重威”，萧何的辩辞看似功利而权谋，但从建筑文化的角度看，又并非没有道理。纵观古今中外历史，大多数国家、民族都有一种营造宏伟壮丽建筑物的意识，从古埃及金字塔，到欧洲中世纪哥特式教堂；从“太阳王”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，到康熙大帝的紫禁城；从蒙古草原上巨大的敖包，到复活节岛高耸的石人……宏大建筑在世界文明史上无处不在。人类在满足了基本的居住需求后，又发现了建筑物外在的表现

性，进而开始追求恢弘壮丽的建筑物（建筑群，甚至一整座城市），来展示并纪念他们的力量、智慧和历史。再进一步，这种展示、表达和象征，又具有了教化、规训的社会文化功能。马克思、恩格斯在《德意志意识形态》中曾写道：“人创造环境，同样，环境也创造人。”丘吉尔也表达过类似的意思：“人塑造建筑，建筑也塑造人。”今天这些思想被学术界概括为“社会空间辩证法”，即：人类与环境之间具有相互的作用和影响，人们在创造和改变空间的同时，又被他们居住、生活的空间以各种方式影响着。

建筑的这种力量，对于国家政权和执政者以及社会管理者而言，自然具有非同寻常的战略意义。而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所见的那些宏大建筑，多数也正是由他们来组织营造的。大型建筑工程的推进实施，本身就是国家政治经济实力、国家发展规划、社会治理水平，以及资源调配、社会动员能力的绝好展示。更深层次的，正如当代一位国外建筑大师所说的，“建筑，是用结构来表达思想的科学性的艺术”。国家营造的宏大建筑被有意识地注入执政者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思想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向社会传播的路标、舞台。借由“有思想”的建筑物，人的生活空间被塑造，人们由此产生特定心理意象和行为方式，从而在社会文化层面助力推动形成思想共识和政治认同，促成社会凝聚、民族成长和国家建构。中国历史上，正是营建了壮丽的长乐宫、未央宫，才给西汉宫廷礼制提供了展示的空间。之后历代王朝皆大力营造朝堂宫室，都在试图表达“天人感应”“定于一尊”的大一统政治思想。再放眼世界，当年法国工程师朗方为新诞生的美国规划首都华盛顿时，明确提出：“首都区的建设，从一开始就必须想到要留给子孙后代一个伟大的思想，就是爱国主义思想。”于是有了今天华盛顿尺度惊人的国家广场（东西长3公里），以及充满巴洛克气质和古罗马神圣感的国会山、华盛顿纪念碑、林肯纪念馆。可以说，宏大建筑的存在，对于任何一个国家、政权而言，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合理性、必要性。

但毕竟，宏大建筑的组织动员相

对复杂，会消耗大量的人财物力，谋划不当，极易导致劳民伤财、诱发浮夸奢靡之风等诸多问题，结果得不偿失。特别是在古代传统社会“家国一体”的情况下，统治者的生活空间和国家的礼制空间高度重合，“建制立威”和“纵欲虐民”往往就是一线之隔。处理不慎，就会酿成“朱门酒肉臭，路有冻死骨”的惨状与“楚人一炬，可怜焦土”的危机。因此以“土木之功”立威的思路，始终也为各种主流政治文化所警觉，甚至否定。在记录刘邦萧何未央宫之辩后，司马光在《资治通鉴》中写下自己的观点：“王者以仁义为丽，道德为威，未闻其以宫室填服天下也。天下未定，当克己节用以趋民之急；而顾以宫室为先，岂可谓之知所务哉！”司马光的观点很明确：国家的合法性与统治力，源自执政者的政治思想（包括政治道德），而不在于宫室壮丽。当然在今天从客观的角度来看，没有必要把二者完全对立起来，关键是要把握好主次。政治思想是根本，建筑只是其实现形式、传播途径之一，切不可本末倒置。正如《尚书·大禹谟》所提出的为政之道：正德、利用、厚生、惟和——历代不少古人也将其作为指导大型工程建设的思想原则，即建筑活动应以德性为根本，以实用为标准，以厚生为目标，以和谐为价值追求。这种态度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值得赞赏的。

两千多年前围绕未央宫营建发生的辩论，其实反映的是物质与文化、空间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问题。“要不要搞宏大建筑？”似乎是摆在中国古时历代治国者面前的难题，一个“做也不是，不做也不是”的悖论。而在现代社会，当我们真正了解宏大建筑应有的社会文化功能，明确什么是它们应有的思想灵魂和价值取向，这个恰当的判断是不难作出的。



汉朝太尉杨震的操守

□王春雷

杨震（约59年—124年），字伯起，东汉弘农华阴（今陕西华阴东）人。他出身名门，聪明好学，博览群书，通晓经传。他从20岁后自费设塾授徒长达30年，教授的学生不少成为国家栋梁。品行和学识堪称一流的杨震，在50岁时为大将军邓骘赏识而步入仕途。汉安帝时历任县令、刺史、太守、太仆、太常、司徒、太尉等职。杨震为官20多年，极具操守，堪称后世楷模。

清正廉洁，生活俭朴，不给子孙置产业。杨震在为官20多年中，始终以“清白吏”为座右铭，“不受私谒”。关于杨震，最广为人流传的便是“四知先生”的故事。当时，杨震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途中，路经昌邑。昌邑县令王密是杨震任荆州刺史时提拔的官员，为了报答杨震，特备黄金十斤，乘夜深人静时送给杨震。杨震不受，还批评他：我和你是故交，关系密切，我很了解你的为人，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，这是为什么？王密说：“深夜无人知道。”杨震却说：天知、地知、我知、你知，怎能说无人知道呢？王密十分惭愧，只好作罢。杨震“暮夜却金”，后人称他为“四知先生”。杨震在任涿州太守时，从不吃请受贿，也不因私事求人、请人、托人。杨震为官，不修豪华宅府，素菜为食，衣无锦绣，不乘马车，即使在被蒙冤、罢官时，仍以死明志，要求子女“以杂木为棺，布单被裁足盖形，勿归家次，勿设祭祀”。他的子孙也和平民百姓一样，蔬食步行。亲朋好友劝他为子孙置办些产业，杨震坚决不肯。他说：让后世人都称他们为“清白吏”子孙，这样的遗产，难道不丰厚吗！

选贤任能，按法循理，不趋炎附势。延光二年（123年），杨震升为太尉。汉安帝的舅舅、官居九卿之一的耿宝向杨震推荐中常侍李闰



的哥哥入朝做官，被杨震拒绝。耿宝又亲自到杨震家里拜访，并借用皇帝的威势逼迫他道：“李常侍国家所重，欲令公辟其兄，安唯传上意耳。”杨震义正辞严地回绝道：“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，故宜有尚书敕。”耿宝理亏，愤恨离去。后来，皇后的哥哥、官居执金吾的阎显也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友，杨震同样予以拒绝。

不顾得失，不畏权贵，敢于忠谏。永宁元年（120年），杨震上任司徒。第二年，邓太后逝世，朝廷中皇帝内宠开始横行。汉安帝乳母王圣，深受皇帝信任和尊重，因此骄横放纵，连她的女儿伯荣也经常出入禁宫，传递贿赂。杨震给皇帝上书说：臣听说君主自古以来施政，主要是选用德才兼备的贤能人士治理国家，所以唐尧虞舜时代，贤能有德的人都在朝中为官，天下百姓心悦诚服，国家一派兴旺发达的气象。当今之世，古人推崇的德行，未能发扬光大，而奸佞小人却充斥朝廷内外。阿母王圣，出身卑微，因遭千载逢机会，得以奉养圣上。……安帝收到奏章后，不仅不采纳杨震的忠谏，还把奏章给乳母王圣看。王圣的女儿叫伯荣，已故朝阳侯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趋炎附势，娶伯荣为妻。安帝因此让刘瑰承袭了刘护的爵位，官至侍中。杨震坚决反对，上书劝说安帝：在爵位的继承上，自古以来都是父死子继，兄亡弟及。今赐刘护的远房堂兄刘瑰承袭

了刘护爵位为侯，而刘护的同胞弟弟刘威如今还健在，为什么不让他刘威袭其胞兄刘护的爵位而让刘瑰承袭呢？刘瑰没有任何功劳和德行，仅仅以匹配阿母之女的缘故，一时间就位居侍中，又得以封侯，这既不符合祖制，又不合乎道义。请陛下以历史为镜鉴，按照帝王应该遵循的规则办事，得人心，安天下。对杨震的忠谏，安帝仍然不予理睬。延光年间，杨震任太尉，安帝下诏派人为阿母王圣修建府第，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等人从一旁推波助澜。杨震又向安帝上书忠谏，未果。樊丰等人见安帝不听杨震的苦谏，便更加肆无忌惮，进而假造诏书，调拨司农所管国库钱粮、大匠所管现成材木，各自大起家舍和园宅，耗费人力及财力不计其数。为了规劝皇帝亲贤臣、远小人，杨震再次上书忠谏。安帝一点也听不进去，还对他心生嫌恶。樊丰等人对杨震更是侧目而视，恨之入骨。延光三年（124年）春，安帝巡游泰山，樊丰等人乘机大建府第。杨震通过盘查，得到了樊丰等人伪造诏书的证据，于是写好奏章准备上奏朝廷。樊丰等人获悉后非常害怕，当时恰好发生自然景象变化，樊丰等人将其归罪于杨震，并在安帝面前造谣。安帝下诏，让杨震回归故里。杨震接诏后动身返乡，途中被陷害，饮毒酒而死。

一年后，汉顺帝即位，樊丰、周广等人被处死。杨震门生上书，要求重查杨震冤案。顺帝下诏平反，并以高规格的礼仪改葬杨震于华阴潼乡。改葬这天，老百姓络绎不绝，来送别这位极具操守的好太尉。

